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邹振环 著

ERSHI SHIJI ZHONGGUO FANYI SHIXUESHI

非外借

中西書局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邹振环 著

ERSHI SHIJI ZHONGGUO FANYI SHIXUESHI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 邹振环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10

ISBN 978 - 7 - 5475 - 1339 - 2

I. ①邹… II. ①邹…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史学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H159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298 号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邹振环 著

责任编辑 毕晓燕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66 000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1339 - 2 / H · 074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 - 65315462

目录

导 言	1
第一节 翻译、中国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学	1
第二节 作为专门史“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范围、取材与分期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本书结构	8

上 篇

第一章 20 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	19
第一节 发轫时期的译书目录与《译书略论》	19
第二节 梁启超的佛典翻译史研究	29
第三节 “翻译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其运用	33
第四节 早期翻译史研究的三大家：郑振铎、贺麟与阿英	39
第五节 综合性历史与文献学著述中的翻译史	47
本章小结	57

第二章 20 世纪中期中国大陆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	58
第一节 《翻译通报》与“中国翻译史特辑”	60
第二节 俄苏作品的翻译和俄苏翻译史研究的转向	77

第三节	翻译出版史史料派两大家：阿英与张静庐	82
本章小结		90
第三章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	92
第一节	方豪与明清之际西书中译史研究	93
第二节	张振玉《译学概论》与孟瑶《中国小说史》中的“译史”与 “译论”	99
第三节	释道安、张曼涛、裴源与王文颜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研究	105
第四节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	117
第五节	90 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研究	124
第六节	台湾区域性翻译史研究论著的空缺	129
本章小结		135
第四章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	137
第一节	韩迪厚与汉文系统的第一部英文汉译史	138
第二节	曾锦漳的《林译小说研究》	145
第三节	罗香林与西书汉译及汉籍西译史的研究	154
第四节	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第一套互译目录：《中国译日本书 综合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	161
第五节	香港的中文《圣经》翻译史研究	172
第六节	董桥的《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	198
本章小结		200

第五章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202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专题资料的汇编	203
第二节	1984 年：中国的“翻译史”年	207
第三节	翻译家自述、口述和访谈的出版	216
第四节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219
第五节	译名问题讨论集	224
本章小结		232

下 篇

第六章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上）	
		237
第一节	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	238
第二节	科学翻译史料的清理	245
第三节	译学理论与翻译思想史	251
第四节	翻译出版传播史	258
第五节	翻译教学史	261
第六节	断代翻译史	276
第七节	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	288
第七章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下）	
		305
第一节	翻译文化史与比较翻译史	305

第二节	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	310
第三节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	316
第四节	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	322
第五节	以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	329
第六节	翻译词典中的译史资料与译史研究	338
第七节	汉籍外译史	352
下篇小结		374
全书结语		377
引用资料		391
书影索引		423
后 记		427

导 言

第一节 翻译、中国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学

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意味着我们的知识有多种多样的来源,跨国越界交流的结果使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翻译”的世界中,全球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一件百衲衣,每个文化的地点,都是一个诸文化的交流地。于是,在文化研究理论中,“翻译”可以作为一种隐喻、一种修辞的图像,一方面描述文化生产之日渐国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描述那些挣扎于两个世界与两种语言之间的人的困境和摆脱困境的努力。翻译作为一种隐喻,可以标志着边缘位置的主体,在主流文化中暧昧不明的生活或生存经验。介于两种文化之间互动而生成的“翻译”活动,渐渐成为文化创造的新基础,一种新的生产空间。^①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致力于西书中译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介绍新知”,在民族救亡和“强国强种”的“危局”中,“翻译”也是一种民族生存的需要,甚至是一种文化体质的改造,正如当年王国维所言:“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②“翻译”的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混杂性的文化形态。

翻译活动在中国起源很早,《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

① 参见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3.

② 1898年3月1日王国维致许同蒨信,载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页3。

动的记述,最初“翻译”大多是指从事翻译的工作者,或有学者将之界定为近现代的一个新词^①,实为大误。中国古代有近三千年不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也留下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翻译文献,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大约在20世纪初才有了若干关于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翻译史学科的原理、方法作出理论的概括,可以称之为中国翻译史学理论或中国翻译史学原理;二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即笔者所要讨论的翻译史学史。中国翻译史学史和翻译史学原理,构成了中国翻译史学的基本范围,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翻译史研究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

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易经在其博士论文《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中曾讨论了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翻译史引论、翻译实践史、翻译理论史、翻译专题史、元翻译史论,将上述五者构成翻译史论的五大分支。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还可继续下分出中国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世界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区域翻译实践史等,每个系列还可在时间跨度上分出通史和断代史,专题史分支还可分出译家研究、译作研究、学科翻译史、翻译史与文化、翻译机构发展史、翻译教学发展史和其他专题,所谓元翻译史论还可分出翻译史论发展史、翻译史家评论和翻译史理论。^② 该文作者所说的“元翻译史论”,事实上比较接近本书的旨意,即翻译史学科专门史,既要研究学科翻译史中不同体裁的翻译史,如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科学翻译史、民族翻译史、区域翻译史、断代翻译史等,又要讨论翻译史理论的发展史、研究翻译史的专家及其成果以及翻译史论的一些理论。毫无疑问,在建立翻译史学的学科分支中,翻译学科的专门史学史,也应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翻译史研究虽属专门史之一科,但由于历史学研究比较注重的是

① 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页204。

② 参见易经《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页215—216。

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之庞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中国翻译史则属于边缘之边缘,一直没有受到史学界的充分注意,“中国翻译史学史”至今尚未进入历史学界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也不见于已经问世的几部《中国翻译词典》。近年来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的论著,也都比较忽略翻译专门史这一门类,所见与本书研究直接相关的讨论,主要有谢天振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该文主要探讨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轨迹,第一部分分析作为编写中国翻译文学史首次尝试的阿英的《翻译史话》,第二部分讨论1960年印行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1957级学生所编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以及80年代问世的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① 穆雷的《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一文,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12部中国翻译史专著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译史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努力的方向。^② 蓝红军的《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一文,从学术史层面回顾了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指出了以往翻译史书写上呈现出整体史和碎片化两种取向,两者虽然各有侧重、功能各异,但两者背道而驰,愈行愈远。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翻译史研究分工逐渐细化,需要更为多样化的书写方式以回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作者提出了会通是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包括宏观与微观、史实与理论、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会通。^③ 上述这些论文着力分析的都是近些年出版的翻译史著作,有明显的“厚今薄古”和“厚今薄近”的倾向,且重点在翻译史家的个案或翻译史著作的评论,类似翻译史学批评,对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基本缺略。因此,系统清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是非常迫切的工作。

① 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页1—18。

② 该文载《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页44—48;类似的内容还见于穆雷《翻译学专著述评》,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8期,页38—40。

③ 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页5—11。

第二节 作为专门史“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范围、取材与分期

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在“常”中求“变”、“变”中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旧”中求“新”、“新”中求“新”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曾经的“常”与“变”以及以往的“旧”与“新”,常常会成为遗忘的对象,也就造成了事实上学术史的某种断裂,也需要我们不断编纂新的学术史来回顾和总结曾经的以往。一门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只有在认识自身学科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本书即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 20 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之所以将时段确定在 20 世纪(1902—2000),是因为笔者一直以为真正的历史判断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才能有一种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清晰度。将所要评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限定在 2000 年前中国的范围内,还因为这一时空内所形成的成果,笔者绝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或者仔细研读过,比较有把握能对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条 20 世纪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谱系。笔者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起承转合”,^①“起”是起步、发轫,“承”是承接、承势,“转”是演变、转折,“合”是汇合、会聚,即尝试通过有限的

① “起承转合”原是解说词、赋、曲、散文、小说等之结构,清代学者刘熙载《艺概·文概》中称:“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起承转合之间的关系,起中有合,合中有起,强调的是首尾呼应,而“承”与“转”兼顾“起”与“合”,为阐述之上下勾连,一脉相承,所以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和互为作用。参见邹振环《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上),载《南国学术》2015 年第 5 卷第 1 期,页 37—57;《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下),载《南国学术》2015 年第 5 卷第 2 期,页 67—80。

篇幅,对整个 20 世纪(1902—2000)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 1949 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 20 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演变过程,作一番专门史的初步考察,成为一部简要的中国翻译专门史的学术史,冠名“中国翻译史学史”。

黄焰结在《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一文中指出翻译史学理论的内容,应该包括探讨翻译史研究过程的理论,即如何研究翻译史和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翻译史的理论探讨,认为这些理论涉及翻译史科学、译史的书写模式研究(如何发掘、整理和编撰翻译史)、译史的元语言研究(对书写翻译史的语言话语的批评研究)、译史阐释理论探讨(批评以往的翻译史论、探讨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或框架来解释翻译史实),以及对译家与译作的评价理论,译史批评理论,译史的定义、类型与特征,译史的目的与范围,译史的分期理论,译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过程等问题的探索;而关于翻译史研究本身的理论探索,则涉及翻译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的价值与功能、翻译史学的层次结构等方面的研究。^① 该文可能是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翻译史学史”这一名称。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史研究。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定位与其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学科范围的界定,又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性质。因此,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比较精确的界定。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绪论”中就极力提倡专门史的研究:“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②《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阐述各种专门史的具体做法,特别是文化专史,如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的不同做法。齐思和则进一步强调专门史又需有专题研究为基础:“语云‘欲速则不达’,

^① 黄焰结《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载《文史天地》2014 年第 7 期,页 92—96。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 1936 年,页 1。

世事且然,何况学术?故学者应先着手基本工作,从事专门研究,细目既明,始可察为专史,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编制课本,又当别论)。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而亟有待努力者,亦无过于专题之研究也。”^①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指对中国翻译的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资料的梳理和历史的反思。与“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②“中国小说史学史”^③“中国音乐史学史”^④“中国科学史学史”^⑤等类似,“中国翻译史学史”亦属于新出现的专门学科史,是指对翻译史学科自身客观历史进程的反省,即研究者主体对这一历史客观研究进程的理解和把握,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中国翻译史学史。本书既有对“翻译史研究”的考察,亦有对这一学科本身的反省,指以这门学科为对象,就它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换言之,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再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立在中国翻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上,它要对中国翻译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排比和阐说,即中国翻译史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

作为翻译史研究的再考察,就中国翻译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言,可以分出翻译史史料整理、人的专史(重要的翻译史家的生平及其翻译史观的分析)、翻译史编纂学的研究,包括翻译通史、翻译断代史、翻译专题史、民族翻译史、翻译地域史、翻译思想史、翻译流派史、翻译出版传播史、翻

① 齐思和《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载蒋大椿等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中国文学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国小说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④ 中国音乐史学史已出版的有陈永《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⑤ 中国科学史学史已出版的有詹志华《中国科学史学史概论》,科学出版社2010年。

译文化史等;翻译史学史可以从研究的结构、撰写的角度和体例入手,有编年体的翻译史学史、翻译家的评传史、专题翻译史学史等。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要致力于把握其内在联系,即不仅要重视整理翻译史研究的史料,也要整理和分析翻译思想研究史的资料,更需要辨析和评估翻译史著的编纂史,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建构一部脉络贯通、历史轨迹陈述流变清晰的翻译史学发展史。

本书主要讨论 20 世纪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也包括少量与此一系统直接关联的外籍学者以中文撰写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论著。考虑到著作在资料积累和体系建构方面,均超过一般的学术论文;且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大多先发表论文后经修改,编著成专门著作刊行,著作往往多包含有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且这些著作大多进行过修订,比较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作者的总体构想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演变。所以本书在取材上,先著作后论文,一般已经被编入著作的观点、思想等,在著作中论及后,不再重复列举论文,如马祖毅、王宏志、陈福康的论著中,许多章节曾多以论文的形式,先行在相关刊物上面世,稍后编入相关论著,作者多进行修订增补,因此,以著作作为本书讨论的主要材料和范本,较之一般论文要更可信。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论文,会专门进行分析,如贺麟《严复的翻译》、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等。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两岸三地学术研究特殊的实况,因此,此一时段在地域范围上,特别注意将大陆、台、港、澳作为不同的系统分别讨论,以显示中国概念的完整性。

撰写一部属于一个世纪的专门学术史同样需要分期,在本书中笔者对很多翻译史的分期进行了讨论和批评。笔者一向认为,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对于学术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作为一部学术史,其分期不能全然等同于政治史,有些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局确实会带来学术的蜕变,但是学术的变化往往不是在很短的政治事件变革中完成的。如西学东渐史,我多将晚明利玛窦的东来作为历史时期划分的界标,而晚清则以 1815 年《察世

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作为起点。^①如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恐怕不会超过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正是本着这一理念,我将1902年作为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起点,将1902—2000年分为1902—1949年、1949—1984年、1984—2000年三个时期。1902—1949年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和初步发展期;1949—1984年为两岸三地中国翻译史研究曲折演进的承势与转折期;1984—2000年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期。当然,分期是人为确定的,而实际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具体内容的论述中,每个时期都会互有参差。

中国关于如何翻译的研讨,有着两千年的传统渊源;但作为中国翻译史系统的“窄”而“深”的专门研究,迄今也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史,仅仅在晚近二十来年才取得了较大的创新与突破。尽管如此,对于这一不长的学科史,进行反省和认识,对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加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对翻译史研究本身的认识与探索,旨在促进译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构建中国翻译史的学科身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设广义的翻译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从翻译史到翻译史学史,再到翻译史学原理的研讨,对于建构翻译史学科的层级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本书结构

本书在方法论上首先采取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在文献整理

^① 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31;《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上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尝试较为清晰地呈现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发展的一般形态，在扎扎实实清理基本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运用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首先采用知识史的理论。学术专门史是知识史的一种，知识史研究是新近兴起的一门研究知识起源、发展、生产、类型、传承与传播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兴起受益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问世。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探究知识产生与演变的过程，通过分析知识的起源、传承、发展和演变，研究这些知识的类型、特征，在各个地方的传播与分布，称之为知识谱系（Genealogy of Knowledge）。

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与侧重精英思想研究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不同，知识史的重点是研究学科演变史，研究知识门类的产生和变迁。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经过人类整理后变成具有意义的公共信息，这些信息再经过知识生产者的加工而逐渐呈现为知识。人类的活动包括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生产主要是通过个体，或者依靠个人为中心的师承脉络。在西方，中世纪的知识生产主体是教会，而在中国除了个体之外，很大一部分还通过寺庙、书院、书坊等机构，随着近代大学的兴起，特别是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大学也就成了中国知识生产的重心所在。东西方古代世界都有通过编纂辞书、丛书、类书、手册或百科全书来解决知识的传承问题，由于知识的不断累积和增长，又通过索引来检索知识的搜寻问题。如何整理和保存信息，是古今东西方知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古代文献整理学科的出现，很大的作用就是对海量的知识信息的整理，近代以来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知识史的研究，比如书籍史、文本史的出现，研究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读者、书评者、图书馆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阅读史的出现，又转变了人们对知识史的看法。当代知识史的研究大致呈现

^①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页 1。

出两个特征：一是从学科“内部史”到学科“外部史”的拓展；学科“内部史”研究各个学科知识的产生、发展与变革，很少述及学科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而学科“外部史”则注重的是学科知识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知识史研究恰恰既重视学科内部史，也关注学科外部史，尤其注重知识生产、传播的机构，如社会组织、知识创造者等所起的作用。二是采用比较方法，即尽可能注重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史。本书一方面着力于翻译史研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关注中国不同地区，如香港、台湾方面的翻译史成就，并注意两岸四地的互动。

由“翻译”和“史学史”两个关键词组成的“翻译史学史”，是介于历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中国翻译史学史显示学术研究的两重维度，即一是中西维度，一是古今维度。“翻译”作为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交流的产物，自动显示出中西研究的广度，即“中西维度”；而作为史学著作，自然必须形成从“古今维度”来关照翻译史研究演变的厚度和深度。全书采取这两个维度来审视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的演变，时段上起 20 世纪初 1902 年的《译书略论》，下迄 2000 年年底，以多叙述、少议论的方式，希望追求一种比较朴实的表达形式，尽可能在叙述中提出作者的见解。笔者重点关注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主题、资料积累和书写方式的演变，当然也不仅是排比史料，也会充分注意与中国翻译史密切相关的学术体制的变化，以及社会变革对于翻译史研究演变的影响，尽力将各个专题内容的讨论，还原到当时的思想和学术及其历史环境之中，避免“后见之明”式的裁断。在具体编排上是以时间为经，以具体的研究个案的主题为纬，尽可能地利用学界关于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论著的分析和评价，以使这一全方位的透析显得公允和全面。

全书分上下两篇凡七章，上篇为前五章，大致是线性式的叙述，下篇六、七两章，基本上是横向的分科式叙述。本书不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写法，尽管在目次上显示出章节两级结构，每章分出若干小节，但实际上笔者会根据手